

引发真理标准 讨论文章问世

纪实

还原历史真实 澄清重大谬误 坚持真理标准

HuanYuan LiShi ZhenShi

ChengQing ZhongDa MiuWu

JianChi ZhenLi BiaoZhun

王强华 编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China Modern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纪实

引发真理标准 讨论文章问世

还原历史真实 澄清重大谬误 坚持真理标准

HuanYuan LiShi ZhenShi
ChengQing ZhongDa MiuWu
JianChi ZhenLi BiaoZhun

王强华 编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China Modern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引发真理标准讨论文章问世纪实/王强华编.—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0221-587-0

I.引… II.王… III.真理的标准-讨论-中国 IV.B0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1692 号

引发真理标准讨论
文章问世纪实

王强华
编

出 版 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320825 (发行部) (010) 88361317 (邮购)
传 真	(010) 68320634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2.5
字 数	223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221-587-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和它惠及亿万中国人民的事实,日益被全世界认同。大讨论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认识,与此相关,引发这场大讨论的《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也日益被关注。

王强华当年在光明日报社工作,任该报《哲学》专刊组组长,是《实》文的责任编辑,又是《实》文从约稿开始到历次修改直到发表整个过程的唯一参与者和见证人。他过去写过几篇文章,介绍《实》文的出台情况,宣传邓小平亲自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历史功勋,并对《实》文的发表与大讨论的展开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探讨。他写的文章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作为一种说法,我们征得王强华同志的同意,选取了他写的5篇文章,及杨西光、马沛文、胡福明等同志的文章汇集成本书出版。

杨西光是当年光明日报社的总编辑,是报社修改《实》文的主持人和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实》文的决策人。马沛文是当年光明日报社的领导成员,积极参与《实》文的修改,坚决主张公开发表。胡福明是《实》文的作者,他对文章的撰写以及修改和发表曾著文细说。光明日报社1999年为庆祝创办50周年出版了一套丛书,其中一本是《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光明日报50年》丛书编辑委员会在该书的出版说明和总编辑王晨的序言中都谈到了《实》文发表及有关情况。中央一个有影响的研究机构曾接受出版社请托,指令专家在审读该书送审稿后对此问题也有一个明确的审读意见。*

所有这些重要而又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有关文章,对了解《实》文问世有重要的

* 这些说法、意见和文章中的观点,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对于某些细节问题,由于各人了解的情况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难免存在差异。为了忠实于原意,我们在汇集出版时,除校勘文字外,未作改动。相信读者能够理解,通过比较、研究,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

参考价值。《实》文的初稿、九次修改稿的小样、定稿清样，忠实地记载了文章的修改过程，更是了解和研究《实》文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徐永军于2003年7月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历史定位》一文，全面地、历史地考察了这场大讨论，他的观点很有见地。以上的说法、意见和文章，有的未曾公开发表，有的虽然发表却未被重视，湮没在其他文字之中，这次我们都把它汇集到本书之中，供对真理标准问题有兴趣的人们研究时参考。为了便于读者把本书的文章和资料贯串起来阅读，本书发表了一位记者近期对王强华同志的专访，这篇访谈录按《实》文流程一一写来，披露了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内情，以期人们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实》文问世的过程。

目 录

- ◎邓小平领导和支持的“真理标准”讨论
 - 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 王强华 /1
- ◎邓小平领导“真理标准”讨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王强华 /9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组稿、修改和发表 王强华 /16
 - 一、《实》文是如何投到《光明日报》的? /17
 - 二、《实》文为什么修改和怎样修改的? /24
 - 三、《实》文到底是怎么发表的? /33
 - 四、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学风、文风? /35
- ◎解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 王强华 /39
- ◎一次成功的重大舆论监督 王强华 /48
- ◎邓小平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动者和领导者
 - 访谈录 记者 陈仪 /54
- ◎杨西光、胡绩伟、曾涛、华楠、于光远、王惠德六同志的联合发言(摘要)
 - (1979年1月19日在“理论务虚会”上) /72
- ◎《实》文发表前的修改情况
 - (1978年7月24日马沛文在首都举行的全国哲学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74
- ◎《〈光明日报〉50年》丛书出版说明 丛书编委会 /76
- ◎序
 -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 /王晨 78
- ◎关于《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书稿的审读意见 /82
- ◎关于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附件 /83
 - 附件一:1978年1月14日
 - 发排的胡福明同志文章(下简称“胡”文)的小样 /83

附件二:1978年1月26日

“胡文”的第一次改样 /89

附件三:1978年1月30日

“胡文”的第二次改样 /95

附件四:1978年2月2日

“胡文”的第三次改样 /100

附件五:1978年3月20日

“胡文”的第4次改样 /105

附件六:1978年4月4日

“胡文”的第五次改样 /110

附件七:拟在《光明日报》1978年4月11日刊出的《哲学专刊》

(第77期)大样 /116

附件八:王强华同志所记1978年4月13日

杨西光同志的谈话记录 /117

附件九:1978年4月13日讨论后,胡福明同志初步

修改的文章小样 /119

附件十:经过1978年4月13日讨论,由胡福明同志初步修改,又经马沛文、王

强华等同志修改的4月20日文章的小样 /125

附件十一:1978年4月23、4日,杨西光、马沛文和王强华同志再次讨论后修

改稿的小样 /133

附件十二:1978年4月27日孙长江同志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改稿 /141

附件十三: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 /148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

——胡福明谈“实践标准”一文的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 /155

◎论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历史定位 徐永军 /182

邓小平领导和支持的“真理标准”讨论

——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

· 王强华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这位历史伟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缅怀他生前的丰功伟绩,教育后人继承他的遗愿,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邓小平的伟大功勋之一,就是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了在十年“文革”中几乎被林彪、“四人帮”破坏殆尽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迷信,把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奋斗,成就了今天国家的辉煌业绩、社会的团结安宁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以下简称《实》文),是“引发”(注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导火线。作为此事的参与者,光明日报的有关同志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总觉得有话要说。这不单是一种感激心情——因为当年《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特评文章以后,正是在报社同志、主要是当年报社总编辑杨西光(注②)承受着巨大压力时,如果不是邓小平高瞻远瞩,挺身而出公开表态支持这篇文章,我们还不知道这一事件(包括参与者)以后的命运究竟如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过去对邓小平的这一历史功勋宣传得不够深入也不够充分,某些不明真相的同志被误导,致使社会上对邓小平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历史定位问题,竟然存在着不同意见。我们感到有责任把有关的历史事实反映出来,略加分析,也许有助于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这么做不是无的放矢。请看2003年《党的文献》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论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历史定位》一文中的叙述:“在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邓小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大家公认的。

但是在具体确定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时,则出现了三种有代表性的意见:一种认

为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者；一种认为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领导者和支持者；一种认为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这三种定位是有差别的，其中哪一种更恰当，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呢？本文试着作出回答。”（注③）。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实际上包括《实》文的发表和“真理标准”的讨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分析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中的历史地位，我以为首先必须分清《实》文的发表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二者固然有必然的联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反映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现在人们对这场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讨论的发动者、领导者是邓小平，对引发大讨论的《实》文最有力的支持者是邓小平，均已认同。但对这篇特评文章的发表，邓小平起了什么作用，有不同意见，因为邓小平自文章酝酿起草直到修改发表都没有直接参与，甚至事先都不知道，当然也就谈不上“发动”，甚至认为与邓小平毫无关系。

看来，《党的文献》上的文章所概括的三种意见的分歧，判断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中的历史地位，有两个关键：一是如何看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酝酿起草和编改发表。由于这篇文章来源和它的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仍有争端（注④）更使这个问题带有复杂性。

另一是如何全面、深刻地理解邓小平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这里，我们首先谈谈前一个问题。

（一）

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第一版上，但约请文章的作者胡福明撰写文章则是在1977年的8月，距离“两个凡是”的公开发表的1977年2月7日，仅仅六个月的时间。如果说，当时约请胡福明撰文就明确说是邓小平的意见，文章要害是批判“两个凡是”，那不是事实。但如果说约稿时没有一个指导思想，一个大的框框，那也不是事实。

决定约稿的指导思想和大的框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当时总的形势和宣传要求；另一个是报纸的特色和需要。当时总的形势是，党中央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的首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

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取得一定成效，但普遍遭遇到一道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在“拨”（批判、纠正）林彪、“四人帮”之“乱”时，对方

动辄就声称这个是毛主席的指示,那个是由毛主席决定或批准,人们的思想因此受到严重的束缚,拨乱反正也就深入不下去。形势需要必须从根本上也即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具体来说,必须要摆正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实践与理论、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经济与政治)的地位,弄清楚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谁决定谁等重大理论问题。

《光明日报》是以理论和文教宣传为重点的中央大报。当时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担任理论部党支部副书记、哲学组组长,负责编辑《哲学》专刊。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根据当时的形势,《哲学》专刊责无旁贷地需要组织和编发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文章。正好1977年8月,江苏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举行了以“经济与政治关系”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我应邀前往参加,并在会上第一次结识了胡福明同志。他当时是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系)的教师。我听了他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认为他思想解放,而且有理论素养和勇气,当即就约请他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稿,并按一般程序向他提出了文章的要求。

胡福明同时寄来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批判江青过去鼓吹过的“女人是生产力”的谬论。另一篇即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第一稿(当时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福明的稿件寄来时我正在外地出差。前一篇稿件被认为江青鼓吹的谬论庸俗不堪,不值得从理论上批驳;后一篇则被认为“纯”理论的色彩太浓,论述的又是一般性的理论原理,没有多少新意,两稿均准备退稿处理。但因稿件是我约的,就留待我返京后决定取舍。1977年12月我从外地返京,阅稿后认为前一稿的确不能刊用,同意退稿,而后一稿虽然讲的是一般原理,而且引经据典的话较多,理论色彩较浓,但文章讲的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突出的是实践在检验真理中的重要作用,联系到“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大肆宣传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学就灵、立竿见影”,这些精神枷锁阻碍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我认为它有很强的针对性,符合当前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宣传要求,就决定留用,并在作了初步地删节处理以后,于1978年1月14日发排了。尔后到1978年4月10日,又经过五次修改,以胡福明的署名放在1978年4月的《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头条)的清样上准备刊出,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按照报社的规定,登载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清样送请总编辑杨西光审阅。他慧眼识珠,果断决定把这篇文章从《哲学》上撤下,要求作修改以后放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他把这件事当作报社的头等大事,为

此付出了极大精力。他亲自动手并精心指导我们对这篇文章进行修改,特别是当他得悉作者胡福明于1978年4月13日从南京来到北京开会的消息,决定立即把胡福明接到报社,并把据闻准备撰写同类题目文章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一位同志请来,杨西光亲自主持会议,商讨文章的修改。杨西光明确指出,文章的修改应坚持邓小平的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冲破禁区。他的这个意见在我临时记下的谈话要点中得到印证。我记录的第一条就是:“完整、准确毛泽东思想体系”,临末又记下:“注意:完整,准确毛泽东思想”。(注⑤)

综上所述,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实》文从组稿、发排到修改,主要是由《光明日报》的同志完成的,决定发表的是总编辑杨西光(注⑥),不是也不可能是邓小平授意的,事先没有向他请示报告。因此,仅就这篇文章的具体运作而论,如果说邓小平是文章的发起者,不是事实。但必须实事求是地说,文章的发表与邓小平决不是毫无关系。

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同样离不开对形势的分析。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任务就是批判林彪、“四人帮”,在各条战线上拨乱反正。拨乱反正中的最大难题就是划清毛泽东思想体系与毛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意见和决定。“两个凡是”的问题在于把毛主席错误的东西当成毛泽东思想体系,继续贯彻执行。“两个凡是”是1977年2月提出的,邓小平当时住在北京西山,他知道“两个凡是”以后,当即指出“不对”,认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针锋相对地率先表示了与“两个凡是”的不同意见。4月下旬和5月24日,他两次向前去看望他的同志直截了当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的讲话和指示“不行”,他经过“反复考虑”,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7月21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在复出的会议讲话中,再次郑重地系统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含义。后来他与胡耀邦同志谈话时对此作了说明:“我那个‘完整地、准确地’的话是怎么出来的?本来我想不起这个话,我就是根据‘两个凡是’,才提出要完整,准确。”邓小平7月21日和8月8日、18日、23日,还分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十一大”和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多次倡导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抵制“两个凡是”的影响。

邓小平的上述意见,以邓小平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崇高威望,不可能不在全党

和全社会产生巨大、深刻的影响,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指针。只以当时《光明日报》的同志组织、修改和发表《实》文来说,杨西光在1978年4月13日的会上,就明确指出文章的修改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我在1978年3月13日给作者胡福明的信中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反对用“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思想;反对一些同志至今不从实际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并要求作者“把这样意思的话加上”(参见《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第95页)。杨西光的意见是从正面强调文章要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更能体现邓小平的观点;我提的意见虽然没有杨西光的那么明确、具体,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反对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反对不从实际出发硬套某个指示,这与杨西光“坚持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意思是相通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意见,固然有自己对组织、修改、发表这篇文章的认识,但其源盖来自于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自粉碎“四人帮”以后不断倡导的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的教诲。可以这么认为,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上述教诲形成的社会氛围的感染和启迪下,才催生和促成了《实》文的发表。

邓小平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最有力的支持者,同时也是这篇文章的启蒙者(注⑦)。

(二)

认识邓小平在“实践标准问题”中历史地位的另一个关键,即全面、深刻地理解邓小平是这场讨论的发动者和领导者。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也不例外。“真理标准”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的新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中国,对它的讨论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一般认为,这场讨论缘起于1977年2月7日“两个凡是”的公开出台。自此以后,拥护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反对者中最早也最具权威的就是邓小平(有关情况已见本文上述)。特别是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以后,在一次内部谈话中,针对“两个凡是”,他“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引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邓小平的这个观点,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公开论争。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的特评文章。由于这篇文章以理论的形式进一步阐释和论证了邓小平的观点,加上文章公开发表后立刻遭遇到强烈的反对和谴责,引起了邓小平的深切关注。邓小平5月30日在同准备起草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稿的胡乔木等谈话时,要求把支持《实》文中观点的话写入讲话稿中。6月2日,他按事先设想讲了话,公开表态支持这篇文章,实际上在全社会发动并领导了这场大讨论。在这以后,邓小平先后于7月21日同中宣部长谈话,要他不再对真理标准问题“下禁令”“设禁区”;22日同中组部长谈话,肯定他对《实》文的支持,指出“争论不可避免”,根子就是“两个凡是”;8月19日同文化部主要负责人谈话,询问这场讨论是否涉及到文化部,再次表明他同意《实》文的观点;23日又同最先电话批评《实》文的同志谈话,并肯定《实》文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1978年8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到中国,沿途在东北三省、天津市,又亲自召开会议,批判“两个凡是”,支持《实》文的观点。

所有这些,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际上起到了动员和组织的作用。直到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还深刻阐明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性质和伟大意义。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认为有些地区和部门对三中全会的精神没有很好贯彻,“真理标准问题”没有很好讨论,郑重提出了“补课”的要求。从1979年到1984年,连续六年,他至少每年都谈一次有关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问题。1988年、1989年和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三次谈到“真理标准讨论”,他批评“两个凡是”给中国造成了“两年徘徊”。他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论证和阐明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再一次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强调只要坚持“实践标准”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综上所述,对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在中央领导人中间,邓小平发现最早(1977年2月);谈论的时间跨度最长(1977年至1992年,达15年);次数最多(三十次以上,仅《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就有16篇,占这两卷文章166篇的十分之一);内容最深刻、全面,包括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评“两个凡是”、支持《实》文,等等,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强调它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要插入经常性工作、结合实际不断进行,坚持下去。

不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邓小平是这场讨论的发动者、领导者,是符合历史事

实和无人可以比拟和替代的。

注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在社会上“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6~387页)

注②:《实》文发表后,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负责人很快就在一个小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我们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针对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中宣部要把关。紧接着,中宣部部长又在中宣部召开的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区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点名批评了这篇文章,他还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社会上更是流言四起,认为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子的”,甚至有人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逮捕进监狱”;还听说,当时的宣传主管部门通知《光明日报》以后再发表这样的大文章,要送审。

杨西光是坚决主张发表这篇文章的,他还联系《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四家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进行了转载、转播,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当他听到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后,“在思想上、政治上承受了巨大压力”,“准备受到组织处理”。(引自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第247页)

注③: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徐永军。他是持第三种观点的,他在文章中对此作了很好的论述。

我在撰写本文时,引用了他的论点和材料,在此向他表示谢意。

注④:社会上对谁是《实》文的作者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这是《光明日报》同志的观点。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对此作了详尽、翔实的记载。中央一个研究机构受出版社委托,指令专家审读过该书送审稿,认为:“本书比较清楚、真实地介绍了真理标准讨论发动的经过及历史背景,为读者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较为详细和珍贵的历史资料。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均无问题,有出版价值。”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一位曾参与修改的原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是以他写就的文章为基础,吸收了少量胡福明文章的内容,由他“捏合”而成。对此种意见,《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根据《光明日报》保存的文章初稿、历次改稿、定稿小样和当事人的回忆,进行了说理分析,认为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与《光明日报》的同志一样,对《实》文进行了修改,起了编辑人的作用,但都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

注⑤:我临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的杨西光在会议结束前的发言片段(摘要):

完全、准确毛泽东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在揭批“四人帮”中间出现的问题

明朗:真正高举毛主席旗帜

注意完整、准确毛泽东思想

实践检验

两个凡是

(以上摘要请见同上书第181~183页)

注⑥:《实》文是杨西光自主决定发表的。在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审定的一个介绍杨西光生平的材料中,明确指出《光明日报》上的《实》文,是杨西光“亲自主持修改和果断决定发表”的。社会上有人宣传说这篇文章组织来以后杨西光不敢发表,所以找了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修改,并最后送请胡耀邦审查同意后才发表。这不是事实。据我所知,杨西光决心要发表这篇文章。之所以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来修改,是杨西光听说他们也在酝酿、构思这样的文章,为了集思广益,把胡福明的文章改得更好,没有也不可能想要更换作者,以党校的同志来代替胡福明。

之所以送请胡耀邦审阅,主要原因是在杨西光“串连”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转载、转播时,有的同志提出最好能请某个“权威”人士看看。为了争取更多的媒体转载、转播,扩大《实》文的影响。以后听到上述《光明日报》不敢发表的传言,杨西光认为并非如此,于是就愤然对中央党校的同志说:此文如果在中央党校的内刊《理论动态》刊发,请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请见《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第225,236页),以表示他并非“不敢发表”,愿承担此文的政治责任。据我了解,即使此文不送请胡耀邦审看,有的媒体因此就不转载、转播,杨西光也会义无反顾地把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注⑦:历史不会重演,但有时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1977年的邓小平与一年以后《实》文的发表,同“五四运动”中新文化运动与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对照一下。“五四运动”原本指1919年五月四日爆发的北京学生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下的反帝爱国运动,但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早于1919年,也不发生在五月四日那一天,但人们却称它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原因是,新文化运动与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互为因果,正是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孕育和启发了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并随着学生反帝爱国运动而得到更加深入蓬勃的发展,因此二者以后被人们约定俗成地统称为“五四运动”。

邓小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酝酿、组织、编改、发表的过程中,即从1977年2月开始,就不断发表公开讲话、内部找人谈话、打招呼,要求一定要坚持和恢复“实事求是”;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体系,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等等。他还多次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并且在他领导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率先推翻当时据传是经毛主席圈阅批准了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两个(错误)估计”,解除了套在知识分子身上的“臭老九”精神枷锁,为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这在当时产生了示范作用和重大影响。邓小平的作为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邓小平领导“真理标准”讨论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 王强华

在2004年8月中共中央隆重举行的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了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05年11月中共中央隆重举行了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曾庆红同志在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他在谈到胡耀邦同志“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后,紧接着就指出:“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领导的这场真理标准讨论,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是在现实政治方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生在十年“文革”结束不久的拨乱反正时期,一方面,党中央在政治上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另一方面在指导思想又出现了继续“文革”错误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中国社会正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转折关头。邓小平以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和革命胆识,在“两个凡是”刚刚出台不久,第一个在党内公开批评“两个凡是”不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郑重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把握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这些论述,针对“两个凡是”,标志着真理标准的讨论“从此开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以后,立即遭到主张“两个凡是”人们的严厉谴责并受到压制。邓小平高瞻远瞩,敏锐地抓住这一事件,于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的第一部分就是“谈谈实事求是”,精辟地阐明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在讲话中公开支持了《光明

日报》的这篇文章,公开批评了“两个凡是”。接着他通过个别谈话和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等多种方式,连续进行了大量具体的思想和组织动员工作,从而在全社会发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中央各部门和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人,全国 11 个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中央和地方省级报纸从 6 月开始到 12 月,半年之内共发表了 650 篇报道和文章。1978 年 12 月相继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展了讨论。经过广泛深入地讨论,“实践派”战胜了主张“两个凡是”的人们,为顺利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奋斗,成就了今天的国家强盛、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生活。

另一方面是在理论建设上,邓小平重申实事求是,恢复和完善党的思想路线,在“实践真理观”等许多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前一方面的作用,人们感同身受,普遍认同,已有不少文章论述;而后一方面的作用,相对地说论述得比较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谈几点认识,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大家的更多关注。

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历史的产物。

任何理论,特别是划时代的科学理论,都是继承前人的科学成果,同时具备创新性,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欧洲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们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生活在帝国主义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和理论特色。

那么,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它的理论特色又是什么呢?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还是在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宗教、党的建设等社会各个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许多创新和发展,我们应该不断地深入发